

经典洛阳



【河洛春秋——新安县吕氏家族(4)】

新安吕氏家族,历经明清两代,出过7个进士,绵延兴盛200多年,清代诗人杨淮选编《中州诗钞》称:“新安吕氏为中原望族,甲于全豫。”至今,新安县铁门镇薛村仍有吕氏老宅,县内还有吕家大山、梦月岩祠堂等遗迹。本报记者将带您走近新安县吕氏家族,寻觅其行迹。

清初吕氏家族
名望重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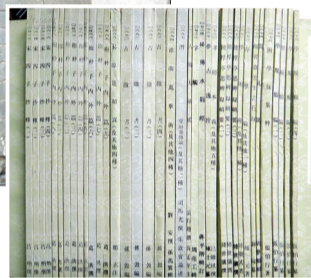
□记者 余子墨 通讯员 于亚飞 文/图

吕维祺去世三年后,明朝灭亡,封建王朝翻开新的一页。新安吕氏家族如大厦倾塌,辛苦创立的家业也随之毁于战火中。然而,随着清朝统治的建立,吕氏家族的名望不仅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消失,而且进行了再造,并得到清廷的扶持,最终大放异彩。



↑铁门镇薛村吕氏老宅

↓《孝经本义及其他五种》
(含《孝经翼》)(资料图片)



1 吕维祐“亦抗节死”

与北宋理学大家程颢、程颐一样,吕维祺与其弟吕维祐同样致力于理学研究,被时人视为“二程”。

与吕维祺获得的生前身后名相比,吕维祐是一个被遮蔽的人。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宽考证,吕维祺之父吕孔学原配孟氏生二子,长子即吕维祺,次子名维祐;继室田氏生吕维祺(zhī)。

吕维祐,字泰孺,由贡生选为山西乐平知县。崇祯十四年(公元1641年),吕维祐被李自成杀害不久,解职归家的吕维祐“亦抗节死”。

崇祯八年(公元1635年),吕维祺仕途终结后定居洛阳,此时,吕维祐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吕维祺均住在新安县。出于对理学的喜爱,吕维祐一直跟随吕维祺讲授理学,且颇有成就。

民国《新安县志》(艺文卷)记载,吕维祐与吕维祺合著有《切法正指》一卷,此外,吕维祐还自撰有《孝经翼》一卷。

李自成带来的社会动乱导致新安吕氏家族顷刻间家破人亡,吕氏族人四散逃命。从吕维祺的孙子吕履恒《冶古堂文集》卷五《先孺人状》中可知,当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对新安吕氏家族的打击非常大,吕维祺的后人为了躲避灾难,不惜举族长途迁徙。他们先渡过黄河居于孟县(今焦作孟州),后又辗转多地,衣食无着,最终在吕履恒的外祖父王铎资助下,吕氏族人重新返回新安。

公元1646年,吕维祺的长子吕兆璜、次子吕兆琳及家人回到新安,在吕维祺的出生地横山定居下来,当时存有梦月(岩)祠。另一支由吕维祺的继母田氏领着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璐,逃至新安县铁门镇薛村娘家。此后,这支吕氏开始在薛村生活、繁衍起来,并留下了珍贵的薛村吕氏老宅,诉说着吕氏家族的风雨历程。

2 故交旧友颂英名

现代清史研究著名专家孟森先生在《明清史讲义》里评论明清鼎革的这段历史时认为:“世祖(顺治帝)开国之制度,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,余皆沿袭明制。”

当时,连年的灾荒、频繁的战乱,造成人力、物力的巨大损失,也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。清朝定都北京后,为了“收买”人心,急需重建社会秩序,忠肝义胆“捐躯赴国难”的吕维祺,逐渐在地方民众和士人宦中赢得了好口碑,一时声名鹊起。

吕维祺舍生取义,死得悲壮,可谓明末死节之臣的杰出代表之一。清初之时,最早宣扬吕维祺忠孝节义的是他的一帮故交旧友。明清鼎革对他们来说,不仅是易代之痛,也有“异族”入侵之辱。

当然,现在看来,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是一种历史必然,而建立清朝的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然而,亡明的士大夫们却想不明白,清廷入主中原之后,他们或者选择归隐,采取不合作态度,或者不得已出仕为官。

无论是归隐者还是出仕者,都对明末殉国的忠贞之士颇为推崇。吕维祺曾做官转任南北十多年,离职归乡居住十三年,结交了大批名流贤士。其中,既有王铎、吴伟业(号梅村)等在清廷为官的明末故吏,也有孙奇逢这样屡召不仕的理学名家。虽然他们对待清廷的态度不同,但是都与吕维祺这位忠肝义胆的故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在他们的相关著作中,我们可以看到怀念故友吕维祺之作。

孟津人王铎,与吕维祺既是好友,又是儿女亲家。听到吕维祺被杀的消息,他悲愤地写下“风黯城崩旧洛原,怜君誓死不徒存”的诗句,借以悼念吕维祺的忠孝节义。

据华中师范大学硕士郭微考证,康熙三年(公元1664年)冬,吴伟业途经新安县,专程到吕维祺墓前祭拜,称其“得死所于周公忠能致主;传遗经于孔子孝可格天”,并给予吕维祺“学术醇正,忠孝完人”的崇高评价。

此外,曾与吕维祺一起讲学论道,在进入清朝之后屡召不至的中州理学大家孙奇逢,也对故友十分推崇,称其“有真学问,有真事功,有真节义”。

在清初的特殊政治背景下,王铎、吴伟业、孙奇逢等人,或为位高权重的显宦,或为声名远播的文坛宿儒,皆有较强的影响力。他们自觉地吟咏传颂吕维祺的忠贞,这种传颂也很快地得到了清廷的认可,吕维祺这位明末忠臣也得到了清廷的肯定,先后准予将吕维祺入祭山东、南京和中原地区的名宦祠和乡贤祠。

3 清廷扶持吕氏家族

明代俞汝楫编著《礼部志稿》称:“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及于民者,谓之名宦;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,谓之乡贤。”清朝立国之后,在地方崇祀名宦和乡贤的制度,皆沿袭明朝。

名宦、乡贤之祀由来已久,在明代官方的积极推动下,逐渐制度化和普及化。明代的名宦、乡贤之祀,目的是“轨范后人”和“风动一郡”,借以扶世导民,在维护和改善社会教化的过程中,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由此可见,能够入祀一地名宦、乡贤祠的,都是当地社会的精英,地缘亲近感使得当地民众能够口耳相传,对先贤的德行、功绩了然于心。人们对先贤的德行、功绩熟知之后,景仰、追慕之情便油然而生,从而把先贤作为榜样,因此能“使官于斯者,皆有志名宦;居于

斯者,皆有志于乡贤”。

从吕维祺对理学尤其是《孝经》的推崇来看,他对名宦和先贤一定充满向往。他退居洛阳后,当洛阳城被李自成率部攻陷时,仍与家丁一起积极协助官军守城,直至城破被捕。他的行为非常符合名宦和乡贤的标准。

入祀名宦、乡贤祠,对吕维祺而言,可谓心想事成。同时,对于新安吕氏家族来讲,吕维祺能够在多地入祀,这不仅是对吕维祺的褒奖,更是新安吕氏家族的莫大荣誉。

据新安吕氏家谱资料记载,顺治皇帝为了表彰吕维祺的忠烈,钦赐御祭碑立于其墓前。康熙初年,新安地方官员为了宣扬吕氏家族的忠孝,将吕维祺的出生地横山改名为慈孝庄,取“母慈子孝”之意。

乾隆年间,为了风励臣节,进一步宣扬忠君思想,清廷对吕维祺

的褒奖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乾隆四十一年(公元1776年),清廷给予吕维祺“学崇正谊,守励清操,矢志殉城,堪称完节”的崇高评价,并谥号“忠敬”。

清廷对吕维祺的诸多褒奖和宣扬,一方面是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,另一方面更是对新安吕氏家族的大力扶持。

尤其是在改朝换代、家道中落之时,清廷给予新安吕氏家族的殊荣像强心剂,给其成员莫大的精神鼓舞。他们凭着自身的努力,通过科举入仕,最终使该家族成为名满中州的忠孝门第,也创造了五世进士的家族辉煌。

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,他中年考中进士,为家族后人发奋图强起了表率作用。吕兆琳还沾了父亲的光,被康熙赞为“此名臣后,应是好官”。



15194553610
13837960279
66778866

孙秋良工作室